

# 全球语境中双语教育的困境与出路

王兆璟<sup>1</sup>, 肖 聪<sup>2</sup>

(1.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甘肃 兰州 730070;

2. 西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 双语教育与族群认同、语言认同、民族认同以及多元文化一起构成了极其复杂的现象。作为一种全球性的教育现象, 发展至今, 双语教育亦显现出一种全球性的困境镜像, 这种困境的形成与文化传统、经济发展、国际国内政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为此, 不同类型的双语教育国家都进行着各自的突破理路。从已有的双语教育政策及推行效果来看, 当一国的双语教育走进困境的时候, 智慧地认知多元文化的实质, 进行“顶层设计”, 推行真正意义上的多元文化政策才是合理之举。

**[关键词]** 双语教育; 教育政策; 困境; 出路

**[中图分类号]** G 75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9162(2013)05-0059-07

语言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 是民族认同的基础, 承担着保存传统文化价值的使命。世界上大部分多民族、多语言国家都有明确具体的关于民族语言以及协调不同语言关系的政策法规。<sup>[1]</sup>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在 1951 年的报告中就指出懂得一门世界性语言能够帮助增强民族之间的了解, 应鼓励掌握世界性语言的教学。鲁宾 (Rubin) 在《双语教育与语言规划》(1979) 一文中阐述了双语教育规划之必要性和重要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城市教育教授 O·加西亚 (Garcia) 论述了全球化背景下的双语教育所面临的挑战和重要性。<sup>[2]</sup> (PP. 11—12) 正因如此, 世界上大约有 125 个国家的宪法涉及语言政策; 有 78 个国家确定了一种官方语言或国语, 有 18 个国家确定了两种官方语言或国语, 5 个国家确定了三种官方语言或国语, 4 个国家确立了四种官方语言或国语。<sup>[3]</sup> (PP. 14—15) 显而易见, 双语或多语已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教育镜像。就全球范围来看, 在后多元文化的当今世界, 各国的双语教育政策在某种程度上都遭遇到了严峻的挑战, 双语教育实践处于繁荣之后的“霜冻期”。为了有效地分析这些现象, 我们区分了语言政策的三个组成部分: (1) 语言实践, 即对语言库中各种语言变体所做的习惯性的选择模式; (2) 语言信仰或语言意识形态, 即对语言本身和语言使用的信仰; (3) 语言规划或语言管理, 即通过各种语言干预、规划或管理的方法来

改变或影响语言实践的具体行为。<sup>[3]</sup> (PP. 7—8) 我们将采用语言实践、语言信仰和语言规划去分析一国的语言政策, 并在此基础上以全球视界探讨各国双语教育政策的困境和出路。

## 一、单语制国家双语教育的困境与出路

为了分析纷繁复杂的语言现象, 兰伯特 (Lambert) 根据各国社会语言的总体状况把国家分为三类: (1) 民族语言同质国家, 如日本、中国和美国等; (2) 双语制或三语制国家, 如瑞士、比利时、斐济和加拿大; (3) 多民族多语言混合型国家, 如尼日利亚、印度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等。民族语言同质性国家通常认为它们的国语已经选定, 所以, 语言政策的重点是关注标准语言形式的规范性, 同时也适当关注其他语言 (如外语) 的学习, 有时还制定本国语言向国外推广的政策。而后两类国家则往往被困于由官方语言的选择问题而引起的辩论中。<sup>[3]</sup> (PP. 67—68) 冰岛是世界上单语制最明显的国家之一, 法国在语言意识形态和语言管理方面也被认为是单语制的国家。

### (一) 冰岛

冰岛现有人口 27 万, 他们只使用一种语言——冰岛语。虽然冰岛的宪法根本没有提到语言问题, 但是从语言实践的角度来看, 英语和丹麦语在冰岛的使用范围非常广

**[收稿日期]** 2013-07-18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新疆维汉双语教育有效推进模式研究”(11JJD880023); 教育部 2011 年度新世纪人才支持项目 (NCET-11-0909); 甘肃省财政厅高校基本业务费支持项目

**[第一作者简介]** 王兆璟 (1969—), 男, 甘肃临洮人, 教育学博士, 西北师范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从事比较教育政策研究

泛。早在17世纪，丹麦语已经成为冰岛的商界用语，并被上流社会广泛使用。

深入分析后，我们发现：民族主义和英语是影响冰岛语言政策和双语政策的两大主要因素。在民族主义的影响下，冰岛从17世纪就开始了“净化语言”运动，其目的只有一个：排除冰岛语中的外来语元素。独特的地理位置让冰岛“净化语言”运动的目标指向了丹麦语。而这项运动就是为了显示冰岛语与丹麦语的不同，并与之保持距离。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冰岛出现了第二个语言敌人——英语。1946年，仍然受民族主义的影响，冰岛为了支持语言的净化运动成立了冰岛语言委员会（the Icelandic Language Council）。1999年受英语的巨大影响，冰岛进行了教育改革，其改革的重点是改变丹麦语和英语在冰岛的地位。改革之后，学校推迟了丹麦语的学习时间，减少了丹麦语的学习内容；但是提前了英语学习的时间，增加了英语学习的内容。<sup>[3]</sup>（PP. 70—72）

语言实践、语言信仰和语言规划深刻地影响着一国的语言政策和语言教育政策。许多国家实施双语教育政策的原因正是因为在其官方语言之外，还存在着另一语言的广泛使用。但冰岛是个特例。从17世纪开始，冰岛就在民族主义的影响下开始了针对丹麦语的“净化语言”运动。然而，冰岛的语言政策并没有改变丹麦语在冰岛广泛使用的现实。因此，冰岛的语言政策与语言实践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在这对矛盾的张力下，当代冰岛的学校中已有少量的时间用于丹麦语的学习。但是，丹麦语仍然没有作为教学语言出现在冰岛的学校教学中。当代冰岛的语言政策面临的困境是：继续在民族主义驱动下抑制丹麦语的发展，还是认可丹麦语在冰岛广泛运用的语言实践？英语，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展示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许多国家将英语看作一种语言资源而大力发展英语教育，因为英语对于推动一国的经济展示了巨大的作用。受英语的影响，冰岛也开设了英语课程的学习，然而它同样没有开设双语教育课程。很多双语教育研究专家已经通过许多实证研究证实了双语教育对于个体学习语言和文化所起的重要作用。因此，无论是面对国内丹麦语广泛使用的语言实践现实，还是面对全球化进程中变得越来越重要的英语语言，冰岛都需要实施双语教育去应对这一问题。

## （二）法国

法国，作为单语制国家的另一个典型代表，从语言意识形态和语言管理方面来看是单语制国家。但是，在语言实践中，法国和冰岛相比更具有语言多样性。《民族语》杂志列出了法国境内使用的37种语言，其中有7种语言的使用者超过50万人。它们是阿尔萨斯语、巴斯克语、布列塔尼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语以及卡拜尔语。另外还有5种语言的使用者超过20万人。<sup>[3]</sup>（PP. 77—78）

法国国内语言的多样性不言而喻，但历史上法国双语教育的政策反复不定，时而被推崇，时而又被禁止。究其原因，我们认为“语言认同”和“共和同化”是影响法国语言政策发展的重要原因。如果我们用语言信仰这一维度来分析，就不难发现，“语言认同”正是法国“语言信仰”的深刻表现。然而，法国的“语言认同”又常常与中央集权制的管理模式交织在一起对其语言政策形成双重影响。

早在1790年召开的法国宪法大会上，法国就接受了双语制，通过了一些法令——支持把法语书写内容翻译成地方语言及为双语教师加薪。然而，1791年，雅各宾派执政，他们要求把国家发展成为中央集权制的统一国家。因为教育至关重要，只有每个人都说同样的语言，才能保证教育的公平。平等比自由具有更高的价值。雅各宾派确信，只有统一的国家才能提供平等的机会。共同的语言才能支持全国各地人们之间的交流。由于黎塞留和法兰西学术院的努力，标准法语成为法国精英阶层的通用语言。法语成了国家的象征，而其他地方语言则被禁止。在法国大革命之初，法国的政党认为使用其他语言不是爱国的行为。这种语言意识形态一直延续着，并在1994年颁布的《杜蓬法》（Toubon Act）中得到了重申：“根据宪法，法语是法兰西共和国的语言，法语是法兰西共和国身份特点和文化遗产的基本元素。”<sup>[3]</sup>（PP. 75—76）

从1951年起，法国政府做出了许多小的让步，允许学校开设一些有关法国地方语言的课程。同样在1951年，法国通过了《戴克桑尼法》（The Deixonne Law）。该法允许法国的学校增设巴斯克语、布列塔尼语、加泰罗尼亚语和奥克西坦语等课程。而且，这些地方语言被看作法国普通教育的内容之一，每周的教学时间可达三小时。但是直到1970年，这些地方语言的成绩才可算入总成绩，供学校授予文凭用。1974年起，该表增加了科西嘉语，后来又增添了许多其他的地方语言。自从1994年起，法国政府同意为巴斯克人和布列塔尼人的双语教学支付双语教师的工资。自2000年1月起，所有的法国小学生在10岁时就开始学习外语。在某些地区，学生在13岁时可以选择一门本国的地方语言作为第二外语。实际上，为了达到上述要求，法国公立中学的学生（在15至18岁之间）要学习两门外语，理科学生在16岁以后也要学习两门外语。然而，2002年11月法国政府制定的一条规定又取消了以前制定的允许用地方语言进行双语教育的决定。在法国一些地区（例如，阿尔萨斯），农业依然是主流，地方语言依然占有强势地位。但是在米迪地区（Midi），所有人（不管男女）都需要离开自己的村庄外出寻觅工作，因而村里原先的双语现象就变成了现在的法语单语现象。正如布迪厄（Bourdieu）2001年所说，影响这种语言状况的因素不是语言政策，或者说不仅仅是语言政策，而是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环境。新世纪以来，受英语语言全球化的影响，法国政府在《杜

蓬法》中还增加了一项语言要求：学生要精通法语和掌握两门外语。<sup>[3]</sup> (P86)

从法国双语教育的历史脉络，我们不难看出法国双语教育受语言信仰——“语言认同”的影响深远。而“语言认同”的根源在于“共和同化”。从18世纪起，法国的政党就认为法语对于法国的国家统一有着深远的意义。尽管政党更迭，但是法国政党对于法语与国家统一的认识并没有改变多少。即使受到联合国和欧盟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权利等政策以及英语作为全球广泛使用的语言的影响，法国的双语教育也未能得到较大的发展。因此，法国双语教育政策才会显得反反复复。

法国“语言认同”的实质是对“共和同化”的认可和对“多元文化”的否定。世界上多元文化的批评者通常包含两类群体：激进派和保守派。激进派批评多元文化教育是因为他们相信它不能促进社会体制改革。保守派批评它则是因为他们认为它会威胁社会现状，害怕它会毁掉传统的国家经验（观念），导致民族国家的分裂，而且担心它可能会妨碍少数青年发展参加国家公民文化所必须的技能。<sup>[4]</sup> (P30) 很明显，法国之所以选择“共和同化”而非“多元文化”的初衷也就趋同于保守主义表达的意思。双语教育作为国家重大的政治问题，既涉及国家文化、民族和语言平等的根本问题，也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因此，面对复杂的双语教育现实，双语教育规划或双语教育模式的实施，应该随着少数民族对双语教育需求的变化，稳妥、渐进地推进。<sup>[1]</sup> 然而，当代法国双语教育的困境正是在于对双语教育的忽视和对多元文化的排斥。要突破这一困境，法国需要直面当下法语的现状：法语正处于国内少数民族语言与英语的合围之中，忽视双语教育政策以及真正意义上的双语教育政策，法国政府必然将难以从这一困境之中挣脱出来。面对语言信仰和语言实践的矛盾以及英语作为广泛使用的全球语言的影响，法国政府应该适时改变法国的语言政策和语言教育政策。法国政府真正需要的是有着双语双文化的法国公民。在日益多元的法国社会，文化的冲突是一种必然。然而，双语双文化的使用者却可以减缓出现的种种文化摩擦。因为，只有通过双语教育才可以培养双语双文化者，也只有双语双文化者才可以在发展个人多语能力的同时，达到族群认同、国家认同、乃至文化认同的目的。双语双文化者对于文化差异有着较强的包容心态，而这恰恰是法国当代政府应该选择双语教育的原因所在。

## 二、双语制国家双语教育的困境与出路

新加坡和加拿大是两个多年实施双语教育的国家。这两个国家实施双语教育的初衷和实质各不相同：新加坡实施双语教育的实质在于双语人才对新加坡产生的巨大经济推动力；而加拿大双语教育的实质却是魁北克法语使用者为了保障自身的法语语言使用权而多年斗争的结果。

### （一）新加坡

新加坡是中国之外唯一以汉族（华族）为主的多民族多语言国家，共有四大民族，全国人口大约有320万人，其中76.8%为华人、13.9%为马来人、7.9%为印度人、其他族人口约占1.4%。<sup>[5]</sup> 新加坡的双语教育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建国前的殖民地时期。1956年，《新加坡立法议会各党派华文委员会报告书》首次肯定了母语的教育地位和双语教育的重要性，开了双语教育的先河。1965年独立以后，虽然社会政治和语言环境皆发生了较大变化，但新加坡政府始终将双语教育视为是国家主流教育体系的基石。<sup>[6]</sup>

1965年8月9日，新加坡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共和国。李光耀当选第一任总理。1967年，新加坡停止了国语（马来语）宣传周活动。同年9月，教育部强调英语对新加坡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从1967年以后，新加坡政府已经决定放弃以马来语为主要语言和族际共同语的政策。1970年以后，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多语政策进一步定型，一直延续至今。新加坡的英语、华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同为官方语言。马来语为国语，但英语为工作语言，具有国语的实际地位。教育上坚持双语政策，各民族学生均须学习英语，以作为共同语言，同时也需学习本民族语，作为保留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媒介语。新加坡双语教育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了如下问题：第一，学生学业负担过重。事实上新加坡在推行双语教育的过程中，很多孩子很难在有限的时间内掌握高质量的双语。即使是那些受过华文教育，在家里讲华文的家长也发现孩子的华文水平并不理想。此外，所有学生都必须达到双语教育的要求也不现实，双语要求导致了较高的学业淘汰率。第二，双语教育的实效性差。很多学生在英语水平提高的同时，母语水平却相应地下降了。由于很少运用，华语水平越来越低。第三，产生功能性单语现象。自1978年以来，新加坡在小学和中学的课程中把英语作为第一重要语言，把母语作为第二重要语言。因此，从总体上看，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是不平衡的双语教育，它加强了英语的优势，削弱了母语的地位，影响了民族文化和传统价值观的保留。第四，民族文化衰退。新加坡教育制度下培养的年轻人对自己的文化认识不足，在思想价值观上出现真空。<sup>[7]</sup> (PP. 141—166)

有学者认为：双语教育问题有两个层次，一是法律和政策层面的双语教育问题，二是学习与教学层面的双语教育问题。<sup>[1]</sup> 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恰恰存在这两个层次的问题：第一，从政策的角度来看，正是新加坡颁布的一系列的不平衡双语教育政策造成了新加坡的双语教育困境。政策的不平衡性表现在：新加坡长期以来片面强调英语语言的教学和运用，忽视华文的教学和运用。从双语教育史来看，新加坡在推广华文运动中，恰恰忽视了新加坡母语的教学

和运用。政策层面忽视母语教学与使用的后果是华文的进一步衰退。双语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表明,母语的学习对于第二语言习得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政策正是忽视了母语教学与运用的重要性,才导致了华文的进一步衰落。重新审视华文以及华文背后深刻的文化是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之一。第二,从学习与教学层面来看,新加坡要想走出双语教育的困境,必须推行真正意义上的华文教育,而不能片面地强调英语的学习而忽略华文和母语的学习。将华文作为一门课程的学习方式,并不是双语教育,而只能是将华文作为一门外语的学习。因此,真正意义上推行双语教育,以双语双文化为培养目标的双语教育才是新加坡突破双语教育困境的唯一选择。此外,有效的双语教育的实施离不开有效的双语教育评估和问责、有效双语课程、有效双语教学、有效人员素质、有效的教师专业发展、有效的教学方法、有效的家庭、社区以及政策和政府支持。<sup>[8]</sup> (P7) 这些因素共同推动着有效双语教育的发展,而这也是新加坡双语教育在教学方面应该突破的重要理路。

## (二) 加拿大

加拿大的文明源于北美土著文化,后来又衍生出了法、英殖民地文化,逐渐形成以双语多元文化为特色的加拿大现代文化。从1608年到1759年,法国在加拿大建立了殖民地,同时建立了以魁北克为中心的法国人居住区——新法兰西。法语是80%以上的魁北克人的母语。在魁北克人看来,语言和他们民族的命运与前途息息相关,几个世纪以来,魁北克人一直在为维护法语的地位而斗争。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魁北克民族主义觉醒。他们对加拿大人口越来越明显的英语化,而法语人口的比例逐渐缩小表示忧虑。近三十年来,魁北克省的历届政府,无论它们对魁北克主权独立持何种态度,都在保护法语在魁北克省的地位问题上利用国家机器采取了众多有意义且行之有效的措施。1969年,加拿大联邦政府颁布了《官方语言法》。魁北克省在1974年也通过了本省的《官方语言法》,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法语的单一官方语言的地位。1977年,魁北克省又通过了《101法》(Bill 101/Loi 101),即著名的《法语宪章》(The Charter of the French Language)。自1965年以来,浸入式双语教育在加拿大迅速扩展开来,有超过25万的讲英语的加拿大儿童进入了约1600所左右的法语浸入式学校。至今,在加拿大十个主要省份中只有魁北克省在1971年至2001年期间保持住了法语居民的比例。这一成果的取得源于魁北克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法语化措施。<sup>[9]</sup> (PP. 25—29)

加拿大双语教育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双语教育的理论研究,特别是教学理论、第二语言学习理论方面。第二,双语教育的政策方面。就加拿大双语教学方面而言,加拿大法语浸入式存在着如下问题:其一,学

生的一些语法错误以及接受性技能和产出性技能之间存在差异。此外,斯温(Swain)和拉普金(Lapkin)指出了浸入式教学法的三个主要问题:(1)缺乏系统的、充分的错误纠正;(2)语言输入局限在功能方面(输入的语言几乎全是关于课程内容或与学校有关的话题,而且为了保证学生能够理解,输入的语法和词汇经常被简化);(3)语言输出不够(学生进行持续性写作尤其是讲话的机会很少)。其三,哈尔索尔(Halsall)认为浸入式教育中教师培训和课程教材的开发存在严重问题。其四,彭斯(Burns)认为浸入式研究的效度存在问题。他认为这些评价是建立在“对项目或者参加项目的学生的本质特征没有充分了解的资料”之上的,他强调“细分学生的社会经济特征的重要性”。他还指出很多评价过程中忽视的方面,如管理过程、资源;教师和行政人员关于双语和双文化的教育理念以及对项目的影响;教师培训机构的教育过程、政策、实践及影响;课程指导方针和教学人员配置等。<sup>[9]</sup> (PP. 119—131)

从某种意义上讲,加拿大双语教育的发展代表着世界双语教育的发展。因此,加拿大双语教育的困境不同于新加坡,它的困境体现出的是双语教育领域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教学研究方面出现的困境。加拿大双语教育的突破需要双语教育理论的深入发展,也需要双语教育实践的深刻反思和深入研究。就教学层面而言,哈尔索尔(Halsall)建议:(1)发展一个模型来对学生人数的减少进行细致研究;(2)提供关于浸入式教育方法的持续的教师培训;(3)提高引进和选取教师质量;(4)提供学生能够在课堂上多说的机会;(5)课后多举办与语言相关的活动;(6)要有合适的课程教材。<sup>[9]</sup> (P127)

加拿大双语教育的困境除了需要在理论和实践教学方面的深入研究外,还体现在法语危机以及双语政策方面。目前加拿大的法语也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多元文化以及外来移民的增多使得英、法双语政策最终可能成为悬而未决的问题。移民使得来自其他国家非英法族裔的团体日渐壮大,并在各省成立了诸如意大利人、华人、越南人、非洲人等的社区。他们中的一种母语会对目前加拿大的官方语言模式造成冲击,甚至有可能取代法语成为加拿大第二官方语言。通过争取国家独立的道路来争取语言的独立是行不通的。在和平的前提下解决民族与语言的问题,这是加拿大政局稳定的关键。法语要在加拿大立稳脚跟,法语区的经济必须得到极大的发展;同时法语国家联盟也应该在全世界大力推广法语,提高法语在世界语言中的地位。而加拿大政府要想制止魁省的独立,维持现行的双语政策,必须制定关于双语政策实施的法律,对违反者给予法律的制裁,同时应该强调英法双语在各省范围内的平等地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在各省发展法语教育;并实施强制双语教育(如法语不及格不能升入高一年级),扩大对法语教育的投资;鼓励双语文化,将双语作为加拿大的一个强大优

势加以推广，培养真正的双语人才，实现真正的双语教育的平衡发展。<sup>[10]</sup>

### 三、多语国家双语教育的困境与出路

各个国家都会根据社会发展、民族关系的变化，及时调整语言或语言教育政策。语言和语言教育政策常常是通过语言规划体现的，语言政策表现了国家或社会团体对语言问题的根本态度，语言规划则是落实某种语言和语言教育政策的实施方案。<sup>[11]</sup>

美国事实上是一个多语国家。美国国内存在 176 种语言，但却没有一种语言是被美国宪法承认的。近年来，随着唯英语运动的发展，美国的有些州已经将英语作为州内的官方语言。美国双语教育的发展经历了四个相互联系的时期：放任期、限制期、机会期和否定期。很久以前，欧洲移民来到了美国，这片国土有着各种各样的“本地”语。当意大利、德国、荷兰、法国、波兰、捷克、爱尔兰、威尔士及其他国家的移民群体到达时，美国就已经有了大约二百种彼此间不能通话的语言。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直到“一战”时期，美国人都欣然接受了这种语言的多样化，并且也鼓励不同语言的存在。那时，语言的多样化被认为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并且得到了使用不同语言的宗教团体、报纸、私立和公立学校的支持。在将德语、英语作

为教学语言的学校中可以找到 18、19 世纪美国放任时期的双语教学实例。19 世纪后半叶，在多数的大城市中，其教育模式是英语为单一语言的教育。然而，在像辛辛那提、巴尔的摩、丹佛和旧金山这样的城市提出了二重语言的教育模式。在 20 世纪初，意大利和犹太移民主要就读于主流学校。但是，也存在一些“双语教育”学校，并且它们都得到了许可。<sup>[11]</sup> (PP. 191—192)

双语教育的法律 and 政策的立与废，一直是族群之间、政治集团之间利益博弈的焦点，博弈的过程充分反映在这些国家双语教育相关法律和政策的不断变化、动荡中。美国语言政治的博弈，就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两大传统之争。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民权运动和自由主义的社会背景催生了双语教育事业。80 年代“新保守主义”的里根政府认为实施双语教育计划与美国概念背道而驰。双语教育旨在保护学生的本族语，其结果是他们不能获得足够的英语进入劳务市场参与竞争。移民大量涌入导致美国人口族群结构的变化，少数民族比例显著上升，“911 事件”促使保守主义成为美国社会政治主流，双语教育事业的梦魇随之而来。<sup>[11]</sup>2002 年美国《双语教育法》被废止，美国双语教育实践随之终止。

对美国双语教育产生影响的主要事件通过下表体现出来：<sup>[11]</sup> (PP. 191—192)

年代	美国，立法/诉讼影响双语教育	影响
1906	通过民族法	第一次立法要求移民讲英语，美国化
1923	Meyer 对 Nebraska 的最高法院	宪法批准要求提供使用英语进行教学法规，外语的流利程度同时合法化
1950	民族法修正案	为达到美国化而要求英语读写能力
1954	Brown 对 Board 的教育	种族隔离教育不合法
1958	国家防御与教育法	促进外语学习
1964 <sup>[3]</sup> (P112)	民权法第 6 款	法庭裁决都要根据《民权法》第 6 款来处理语言歧视问题
1965	中小学教育法 (ESEA)	为满足“被剥夺了受教育权利的儿童”的需要而发放资金
1968	中小学教育法案修正案：双语教育，权利 7，	为不会讲英语且生活贫困的儿童建立双语教育计划提供资金
1974	Lau 对 Nichols	确定为英语不熟练的语言少数民族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的语言教育计划
1974	再次确认中小学教育法中双语教育法“权利”7 的权威性	学校用母语对英语不熟练的学生进行教育成为可能，双语教育被定义为“过渡型”(TBE)
1976	科罗拉多州丹佛的第一学区	建立与取消隔离教育共存的双语教育
1977	成立国家双语教育信息中心	为双语教育提供全国信息中心
1978	再次确认中小学教育法中双语教育法“权利”7 的权威性	再次确认对双语教育(过渡型)资助的权威性，“合格的人”的标准被取消，引入“有限的英语水平”这一术语
1983	开展美国英语运动	关于英语在法律、社会及教育中的主导地位的争论突出
1986 <sup>[3]</sup> (P120)	英语第一组织成立	支持唯英语立法，反对后来美国总统《13166 号行政命令》及各种双语教育政策
1997 <sup>[3]</sup> (P120)	儿童英语组织	反对双语教育，该组织于 1998 年成功游说加利福尼亚州通过《227 号提案》，禁止在加州实施双语教育
2000 <sup>[3]</sup> (P122)	13166 号行政命令	为拓展英语水平欠缺者的语言服务渠道制定相关方案和指导原则
2002 <sup>[3]</sup> (P121)	双语教育法：中小学教育法废止	双语教育在美国违法

在某种程度上说,《双语教育法》是一个“假曙光”。从名义上和双语教育项目的某些方面来看,《双语教育法》似乎给非英语学生提供了学习英语的方法,而且也给他们提供了维持少数族群语言的教学项目。不过,为维持少数族群语言而提供教学项目是与《双语教育法》指导者的初衷背道而驰的。实际上,根据《双语教育法》而开发的教学项目一般都是过渡性的,其目的是在保持学生的家庭语言作为学校教学语言的同时,提供高质量的英语教学方法。<sup>[3]</sup> (P122)

事实上,在实施《双语教育法》的34年中,美国的双语教育经常遭到人们的攻击。其中部分原因可以被看成是美国人出于对自己工作和领土的保护。因为双语教育的提倡者认为,只有少数族群社区的成员才可以教授或管理双语项目,而且少数族群社区应该控制这些双语学校。许多双语教育都存在以下问题: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含糊不清以及评价标准模棱两可。由于政府趋向于把这些双语教育项目用于弱势学生和弱势学校,所以仅仅发展双语教育项目不足以弥补多年来对贫困和犯罪的忽视以及由此造成的萧条环境。虽然美国不乏一些好的双语项目,它们不但在标准的制定上而且在地方用语的选择上都是成功的。但是,美国也有许多在标准的制定和地方用语的选择两方面都失败的双语项目。<sup>[3]</sup> (P118) 美国担心西班牙语会对英语的使用发生副作用,所以认为英语处于了濒危之中。美国2000年的人口普查表明,美国有3500万的西班牙裔美国人(Hispanics)或美国的拉美裔人(Latinos),他们是2000万的墨西哥人、350万的波多黎各人、120万的古巴人和1000万来自其他拉美国家的人。具体而言,西班牙语使用者(5岁以上)占美国人口的10%。西班牙语是美国除英语之外的主要语言。<sup>[3]</sup> (PP. 226-227) 按照奈特1999年的看法,世界上任何一个在地理上孤立的社区只要能够在经济上自给自足,并在生态上没有危险,社区人数在150人以上,那么这个社区所使用的语言在短期内可能都是安全的。现在世界上有600种语言的使用者人数不到150人,这些语言可能是最濒危的语言。<sup>[3]</sup> (P234)

美国双语教育政策始终处于语言环境与教育目标的争论中。这些争论的核心集中在三个方面:(1)唯英语教育倾向;(2)文化统一性的驱动;(3)对少数民族语言权的认可。<sup>[12]</sup>在这三个方面的争论中,美国很难在政策中指向一项目标。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为:美国双语教育的历史就是这三种力量不断斗争的历史。当这三者中的某一方占据上风的核心位置时,美国双语教育政策的重心也随之转移。当唯英语教育倾向占据上风时,双语教育的实践就会受到挫败和打击;当文化统一性的驱动占据上风时,安格鲁-撒克逊文化的同化主义就会在美国抬起头来。

2002年之后,虽然美国的双语教育政策被废止了,但

是在现实中,美国的教育政策制定者不得不对课堂中少数民族学生的语言和文化上的多样性。教育政策制定者要做的就是对于课堂多样性的接纳与鼓励。事实上,研究表明美国的家长对于这样一种举动的态度是积极的。<sup>[13]</sup>正因为如此,有学者发出了这样的疑问:“美国是有语言政策还是仅仅有民权?”<sup>[3]</sup> (P105) 美国双语教育政策终结的实质是美国同化主义延续的结果。美国的双语教育政策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多元文化主义理念。面对多元文化的现实,美国的教育政策制定者只有站在多元文化的立场上,将美国多样的语言看作“资源”,才能推动美国走出缺失双语教育的困境。

#### 四、结语

双语现象产生的双语教育问题十分复杂。当各国的双语教育在理论和实践中产生困境的时候,深刻分析和反思这些困境及其突破的理路就显得十分重要。在分析这些国家双语教育的困境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困境往往与一国的文化传统、人口结构、地理位置、经济发展的模式与机遇以及国内和国际的政治环境等有着深刻的联系。随着全球化的更加深入,各国面对着日益丰富的文化多样性。双语教育以其培养双语双文化者的特殊功能,在当代各国正日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双语教育在应对多元文化社会中展示出了极大的积极作用,因此,当今各国都积极推动双语教育的发展。在应对多元文化的现实中,族群认同、身份认同、国家认同以及文化认同等理论和实践仍将深刻地影响着各国的语言政策及其双语教育政策<sup>[14]</sup>。透过语言实践、语言信仰以及语言规划的视角,我们能深刻洞察各国双语教育政策的历史、发展、困境与出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步伐,英语作为世界语言对各非英语国家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在面对英语这一世界性的语言时,各国的语言政策、双语教育政策、外语教育政策都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sup>[14]</sup>。总而言之,不论各国的文化传统、政治传统以及经济发展模式有多大的差异,未来各国都必然会制定完备的双语教育政策。究其原因在于世界的文化多元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双语教育的巨大价值不仅仅在于培养双语双文化人才发展一国经济,更大的价值应该是对于多元文化的认同。这种文化认同不应只停留在狭隘的族群认同的范畴内,更要达到对整个人类文化的真正认同。而实现这一目标,双语教育责无旁贷。我们是否可以这样预设:在未来的国家发展中,哪一国能真正将语言的多样性看作“语言资源”,并将其合理地应用和推动,哪一国就能在未来的长远竞争中取得优势。回到当今各国双语教育的困境面前,我们期待各国的语言政策的制定者怀有长远的眼光和真正认可多元文化的胸怀去引领双语教育走出理论和实践的困境。

[参考文献]

- [1] 万明钢, 刘海健. 论我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从政策法规体系建构到教育教学模式变革 [J]. 教育研究, 2012, (8).
- [2] 张治国. 中美语言教育政策比较研究——以全球化时代为背景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 [3] 博纳德·斯波斯基. 语言政策——社会语言学中的重要论题 [M]. 张治国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 [4] 王鉴, 万明钢. 多元文化教育比较研究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6.
- [5] 黄明. 新加坡双语教育模式与语用环境及语言转移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 (4).
- [6] 王兵, 李旭中. 新加坡双语双文化精英教育探析 [J]. 教育探索, 2012, (8).
- [7] 强余, 等. 国外双语教育的理论和实践 [M]. 西安: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6.
- [8] Howard, E. R., Sugarman, J., Christian, D., Lindholm-Leary, K. J., & Rogers, D. Guiding principles for dual language education (2nd ed.) [M].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2007.
- [9] 俞理明, Elizabeth Yeoman, 韩建侠. 双语教育论——加拿大浸入式教育对我国高校双语教育的启示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9.
- [10] 黄芳. 论加拿大双语问题的历史、现状与趋势 [J]. 历史研究, 2009, (2).
- [11] 科林·贝克. 双语与双语教育概论 [M]. 翁燕珩等译.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8.
- [12] Jill P. Koyama & Lesley Bartlett. Bilingual education policy as political spectacle: educating Latino immigrant youth in New York City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 2011, (5).
- [13] Tom T. Stritikus and Eugene Garcia. Revisiting the Bilingual Debat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arents: Policy, Practice, and Matches or Mismatches [J]. EDUCATIONAL POLICY, 2005, (10).
- [14] 杨友孙. 欧盟少数民族“社会融入”政策述评 [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5).

## The Dilemma and Breakthrough of Bilingual Education in the Global Context

WANG Zhao-jing<sup>1</sup>, XIAO Cong<sup>2</sup>

(1, Research Center for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of Minorities,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PRC;

2, School of Education,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PRC)

[Abstract] Bilingual education together with the ethnic identity, language identity, national identity and multicultural reality constitutes a very complicated phenomenon. In addition, bilingual educ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a country's cultural tradi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well as its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political environments. As a kind of global educational phenomenon, bilingual education also faces a global dilemma. Therefore, different types of bilingual education in different countries have their own breakthroughs. When a country has predicaments in its bilingual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isting practice and its effects, only a scientific and profound theoretical study with carrying out the multicultural policies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ts bilingual education.

[Key words] bilingual education; education policy; dilemma; breakthrough

(责任编辑 王明丽/校对 维佳)